

母語教學與培養學生的自我意識

林沛理

上月底，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公布教學語言政策最後修訂方案，宣布由明年九月開始不再劃分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正式放棄實行了十年的母語教學政策。教育局局長孫明陽表示，學校日後選擇教學語言將有更大自由度，就像在餐廳用膳，「menu 有好多選擇，任你揀」。

這樣說不但低估了教學語言的重要，也小看了教育。教育（education）不可與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混為一談：職業訓練旨在改善學員的謀生能力，以及提升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受聘價值（employability）；而教育則致力培養學生的自我意識，讓他們有足夠的自信和能力去「實現自己」和「發現世界」。這個教育理想古已有之，亦不分中外。古希臘的文學家以及後來的尼采都鼓勵世人"become who you are"，近乎中國人所說的「立己」。巴特農神廟中銘刻的那句箴言："know thyself"，則是中國人所說的「知己」。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認為，知識的累積和展示並非教育的目的，懂得怎樣運用這些知識來幫助思考才是，一如蔡元培所言，大學教育在於培養學生的獨立精神。

因而教學語言的選擇不可單單取決於語言本身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或者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因為它涉及教育的功能和價值取向等重大課題。我們斟酌用母語還是英語授課，首先要考慮的，是哪一種教學語言可以對學生培養自我(development of the self)和認識自我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做出更大貢獻。香港學生嚴重缺乏個性、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正因為他們長久以來被迫使用一種他們無法駕馭的殖民者語言來學習、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這種殖民者語言的「他者性」(otherness)使他們無法與他們身處的社會、學習的環境和他們自己建立親密、私人的關係。這個學習障礙一日不消除，香港學生仍然只會在教室內噤若寒蟬、只懂埋首抄錄教師的一言一語，還奢談甚麼批判性思維與競爭力？

教育局推翻實施已十年的母語教學政策，無論教育局的官員怎樣巧言令色、遮遮掩掩，那扯得高高的白旗還是路人皆見。這樣的結果其實一點也不讓人感到意外。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對香港教育的諸多改革，特別是教學語言的改革，從來都吃力不討好。本來任何挑戰現狀和既得利益的改革建議遭到反對是正常的，但各界對此改革反對之激烈及一致，卻反映了英國撤出香港逾十年，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post-colonial society）仍然深受一種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意識形態的影響。

不少後殖民學(Post-Colonial Studies)的學者，包括薩伊德(Edward Said)都指出，知識(knowledge)與權力(power)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而教育體制，包括教育制度、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至大眾對教育的期望和態度，是殖民者撤離後最死而不僵、最能發揮其殘餘影響力的社會制度。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

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簡言之，殖民地教育要傳授的，就是「主子的教誨」(lessons of the master)。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和統治的手段，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要為缺乏合法性和認受性的殖民政府，取得一種「經被殖民者同意的支配」(domination by consent)。要達到這個目的，殖民地教育一方面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以及西方價值的「普世適用」(universality)；另一方面，又嘗試用套陌生的教學語言，以及背誦、強記、考試主導等「填鴨式」教學法來剝削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質疑的能力，以解除他們(即未來的知識分子)的武裝(disarm)，培養他們的服從性。

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hierarchy of cultural importance and value)；而一套旨在培養順民、製造無力感的教育制度已經牢不可破地植根於香港的土壤和香港人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之中。在這個等級體系內佔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地主人(colonial master)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無可取代。從殖民者的管治角度而言，這套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十分成功。但是它唯一的敗筆，是只顧一味鼓吹對英文的拜戀(fetish of English)，而沒有試圖通過英國文學和哲學來教育、馴化它的殖民對象。香港人對英語文化、英語文學漠不關心，是他們始終學不好英文的關鍵。這跟曾經是英國最大的殖民地的印度的情況有天壤之別。

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一度大力推行母語教學政策，是企圖將學生從一種「被殖民者的無力感」(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colonized)中拯救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母語教學兼具「發展自我」(developing the self)和「啟蒙」的功能。

康德 (Immanuel Kant)認為，啟蒙是指一個人在其他人的指導和協助下，將自己從本身的「不成熟」(immaturity)中釋放出來；而所謂「不成熟」，就是一種無法運用自己的智慧來思考和選擇的思想狀態。在生活的不同領域，香港的學生從來不乏選擇，但由於他們的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薄弱，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曖昧，往往欠缺一種作出明智選擇的能力。

長期以來，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學生讀英文中學或者入英文班，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造成的文化結果。英文是一種「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甚至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難怪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對改革香港的教育、包括課程的改革(curricular change)和教學語言的改革(linguistic change)，雖然顯示了極大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卻反而招致四面八方的猛烈批評。如今她終於放棄堅持了十年的母語教學政策，可以說是對殖民統治再一次的無條件投降。